

绪言：文化苑囿各芳菲

——中国区域文化纵横谈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全面介绍我国区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专书。我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但这些文化的最初形成和表现，完全是以地域为基点而展开的。在远古时代，生活在我国境内各地区的先民们，就基于自身的生存环境和人文素质，创造了符合自身特性和环境特征的各类文化。因其不断改造和利用生存环境，就使文化带有强烈的地域性色彩；因其按照自己的素质去创造自己的生活，就使文化带有强烈的民族性色彩。地域性表现为生存空间的固定，民族性又在历史的长河中凝聚，所以，文化的时空——空是文化滋生、发展的前提和必备条件。

斗转星移，经历过更新世后期的沧桑沉沦，在现今中国的版图范围内，形成了多彩多姿的地貌。这里有一望无际的辽阔平原，有着四周环绕着高山丘陵的盆地，有着萧森苍翠的浩瀚森林，有着广袤无垠的高原山区，也有着辽阔的沙漠和草原。在自然环境中，我国可划为三个自然区，横跨六个温度带。地形和气候造就了许多个状貌各异的人类生存空间。这种生存空间在文化意义上的展开，就是文化区域。但这种文化区域并不等同于我们在本书中所叙述的区域文化。数量性的文化点或文化区域，经过文化创

造主体的有心加工，逐渐递进到较大类型和较高层次的时候，在人们的观念、意识和历史的陶冶中成型之后，才真正表现为附着于一定地理环境中的区域文化。中华主体文化的形成过程，既是各民族文化精华的荟萃过程，又是各文化区域不断扩展和融合的过程。因此，生存的地域和文化的区域，不是人为地强行划分，而是在历史上客观存在的文化实体现象。只是为了更深刻地认识它，科学的研究它，所以才展开了基于文化地域的客观而从事的客观的区域文化的研究和解说。

那么，什么是区域文化呢？概括起来说，它是文化的空间分类，是类型文化在空间地域中的凝聚和固定，是研究文化原生形态和发展过程的，以空间地域为前提的文化分布。它将具有相近的生存方式和文化特征的集结作为单独的认识对象，然后进行历史的和分类的归纳和探源，了解每一个区域文化中所拥有的内容，从而展现文化学中一种分支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大自然赋予人们以生存的条件和环境，人们又根据自身的特征和需求适应或改造着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或不同的人类群体造就了各个地区的文化。我国的文化区域是如何划分、成型和发展的呢？下面我们就谈这个问题。

东西、南北和中外

区域文化是在某特定地域出现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它几乎和“文化地理学”是非常相似的，不同的是“地理”和“区域”的差别，是地区精确与模糊的差别，也就是地理学和文化学的派生学科的差别。文化地理学注重现实状态、区域文化注重历史发展。但生存环境产生的经济文化形态却是两者都相当重视的要素。

按照经济文化的形态，可以把我国大概分为东、西两大部分。划分的界线北起黑龙江流域的爱琿，南至云南腾冲。东部地区是向大海倾斜的平原、丘陵和低度高原，季风气候使这里干湿得宜、四季分明。良好的气候、丰富的水源、较为平坦的土地，形成我国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区域。西半部却是以草原、沙漠、高山峻岭和寒冷高原为主的地区，属于大陆性气候。这样的地形和气候使西部成为以游牧为主的经济区域。正是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差异，产生了与这种差异相适应的不同生产方式——农耕和游牧，由此也导致了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不同文化特征和行为系统。这种划分是整体性的一级划分，自然也免不了相对性中的个别差异。在东部也有如东北和西南山区从事狩猎和游牧的居民，而在西部的河套平原和星星点点的沙漠绿洲中，也有从事于农业经济的一些居民。

不管是古代或现代，人们坐下来谈天说地在涉及到对地区性居民的认识中，大而含之，往往称南方人如何细腻精明，而北方人如何粗犷豪爽。这种对于“南”、“北”的人质认识，大约是人们评价我国人文差别的一种最简明的分类。在这里，文化的差别又以南、北的地理划分成为一种显示和象征。

这种划分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一种观念形态和文化意识。这种以南、北为不同文化区域的划分是在我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后完成的。大约从东汉晚期，北方战乱导致中原移民一次次的南移，人口迁徙和经济南移使原本滞后的南方拥有了可观的文化局面。南北朝时几百年的南北对峙更加成型着这种文化格局，这种格局是在历史动乱的大场景中完成的，古人对此也有着一定的认识，如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十二中就这样说：

三代以上，淑气聚于北，而南为蛮夷。汉高祖起于牛、沛，

因楚以定天下，而天气移于南。郡县封建易于人，而南北移于天，天人合符之几也。大气南徙，而匈奴始强，渐与幽、并、冀、雍之地气相得。故三代以上，华夷之分在燕山，三代以后在大河，非其地而阑入之，地之所不宜，天之所不佑，人之所不服也。

按王夫之所说，南、北的划分是在黄河流域，其实南、北的划分并无明确界限，它只是人们的一种相对观念，如松辽平原的人们视山海关以南均为南方，而两广地区视五岭以北均为北方，虽然这种划分从整体上难以成立，但它却是这两个地区人们的文化认识。这种南、北文化的划分也是一种历史上早就存在的文化现实，它表现在人文素质上尤其明显。古人经常讲：“北俊南嬾，北肃南舒，北强南秀，北僊南华。”至今人们经常还讲“北方人”“南方人”，而不按经济文化的东、西而讲“东方人”或“西方人”，原因大概也在此。

当我们站在多维文化视野的角度，细细审视从亘古到近代的中华文化时，进入到直观的意识之中的，也往往是这种南北的文化分野。我们咀嚼着黄土地，但又忘不了长江水；我们景仰着孔子博大精深的哲学胸臆，也不能忘却屈原在汨罗江上飘动的诗魂。这种南北不同、相映成辉的文化区域划分最后完全渗入到一般意识中的观念形态，成为异常模糊的地界分类和异常清晰的人文分类。

文化区域实际上是实际地域与观念形成的结合体，它与民族的产生又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先秦时代，对于民族的划分统指为“夏”和“夷”，由此也导致了“中”、“外”的地域划分。在“夷”、“夏”对称中，一方面是地域划分，“夷”的意义是“东方之地”。《尚书·尧典》称尧舜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

清代学者孙星衍疏说：“使居治东方嵎夷之地。”所谓“夏”，章太炎认为和特定的地域有关，“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另一方面又意味着民族的不同，《说文解字》解释说：“夏，中国之人也。”夷呢，“夷，从弓从大，东方之人也。”经过古代的民族融合，夏发展为“华夏”，夷进展到“四夷”。华夏成为“中国之人”，四夷成为中国外的四方之人。古文献中常有“四夷宾服”的记载，这四夷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总号也。”（范宁《谷梁传》注）是指在华夏文明外的四大部落集团。尽管我国古代民族繁杂纷纭，这样的划分纯系华夏族的主观认识，但从地域上区别了早期先民活动的不同文化归向。它们居住的地域，泛称为“四方蛮夷之地”，这样又形成了“中国”与“四方”的地域划分和“中”“外”的文化意识。

无论是中国也好，四方也好，它们的地域范围都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地扩大着。“中国”最早指京畿之地，又泛指中原，又发展为九州。而“四方”的概念也不断扩展。三代对外征伐，秦汉拓宽疆域，中国概念在扩展，四方概念也在变化。一些“四方”的地域逐渐被扩展到“中国”内，而“四方”又不断向外展开，最终形成为典型意义上的“中”与“外”，这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总体发展轨迹。在这个过程完成之时，“中”与“外”所具有的国内文化区域的意义也就消失了。

“东西”“南北”与“中外”，都是对我国文化区的最概括的认识和粗略划分，它们以不同的审视角度展现着不同类别的文化区域，但这毕竟太单一，太笼统，因此，在对区域文化的探索中，还必须向更深的程度展开。

文化拼块与文化区系

地理状况造就了不同的生存环境，社会结构和人文素质又促进了文化区域的形成，它们造就了我国的文化拼块和文化区系。从旧石器时代到三代之前，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得到和谐的汇融，从而出现了四个大的文化区系。

一是以渭水和潼关以下黄河为轴线的“中原”区系。它东边是大海，西至泾渭上游的陇山山脉，北按蒙古草原，南界秦岭、汉水上游及淮河一线。这个区系象一把扇形从西部向东部展开。这里大部为平原及丘陵地带、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它有着适宜农耕的大片土地和濒临大河的丰富水源，是良好的人类滋生之地和天然农业区。这里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人类最古老的发祥地之一，与这里良好的自然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在中原文化区系中，有着丰富的史前文化遗址，闻名世界的“北京人”就是在这里发现的，其他如兰田人、大荔人、丁村人、峙峪人等。可以说，在当今使我国成为人类起源研究中心的重大发现中，论文化数量之众多，材料之完整，内涵之丰富与时代之系统，均集中于中原区系。这里是典型母系氏族遗址——仰韶文化和父系遗址——龙山文化的发祥地，由此延伸出的半坡、姜寨类型和诸龙山类型的遗址几乎遍于整个中原地区。我国的文明时代也从这里揭开了序幕，成为我国魏晋以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二是以滇北长江以下为轴线的南方区系。这里东边也是大海，西包巴蜀，南至南海，北依中原。这个区系海岸线长、纬度低、气温高、无霜期长，受海洋季风气候影响而多雨。这里也有很好的发展农业的条件。但由于地形复杂、山陵多，河、湖水区广，加上古代物质技术的水平限制，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很难进行对

外和内部之间的文化交流，没有交流就不会有长足的发展。另外，良好的生存环境也并非为人类所专有，诸多虫蛇豸兽出没，瘴气瘟疫并行，而溽湿多雨对人类居住条件的限制，也往往使人类望而却步。也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能够征服这些不利因素，改善居住环境，才会使这里的文化得到孕育和发展。在南方文化区系中，也有许多著名的古人类遗址。例如，迄今发现我国境内最早的古人类——元谋猿人，就是在这里发现的。其他诸如长阳人、马坝人、资阳人、柳江人等。新石器时代，则有颇有名气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良渚、大溪、屈家岭诸文化。诸多文化遗址表明了这里也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发祥的重要地区。但由于多种原因，在纵向时间和横向空间的信息量上，这里远不如中原区丰富多彩而系统清晰。

三是北方文化区系，这是隔中原而与南方文化相对应的地域概念。它的实际地域大体上以蒙古高原为中心向外延展，就文化形貌而论，东部可以延展到白令海峡，西至阿尔泰山，北起贝加尔湖、西伯利亚南部，南至辽河流域山海关一线及长城北部的燕山山脉尾间。这里大部属大陆性温带草原气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蒙古高原气压中心，是亚洲季风气候区冬季寒潮来源地之一。因此，气候干燥而寒冷，雨水资源不足。这里有辽阔的草原，也有延伸的山脉，也有临水源的松辽平原。但由于气温低，水量并不充沛，所以虽能农耕但相当艰难，自古以来以畜牧业为主。在蒙古草原区，其南部接近中原区系的地方，也发现了属于旧石器晚期的“河套”文化，它包括水洞沟文化和萨拉乌苏河周围的文化。至新石器时期，这里出现了以反映畜牧业、渔猎为主的细石器文化，这个文化的密集带，就出现在东北、内蒙、宁夏等地长城的北侧和天山北侧。在与中原靠近的地区，则有红山文化及张家口地区的三关、筛子绦罗、准格尔旗窑子梁、托克托县海生不浪东、

阿拉善旗白音浩特、宁夏陶乐高仁镇等文化遗址。这些遗址文化的内涵，反映着它们既有农业因素又有狩猎游牧经济生活的因素的双重文化特征，同时也说明了也正是基于生产力的发展，才使农业经济达到与畜牧业经济相提并列的水平。

最后是青藏高原区。这里是高原地带的“世界屋脊”，耸立着世界上最年青、海拔最高的山峰，地壳变化的大陆板块运动使喜马拉雅山脉突兀而起，它的难以跨越成为东部向外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雄峙的高原阻挡住了印度洋大气的北袭，这里天气寒冷，空气稀薄，不利于远古文化的发展，在远古时代人们生产力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在这天寒缺氧的高原地带很难生存。因此，这里古文化遗址少而单一。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可以说是十分少见、寥若晨星。新石器遗址也是晚期居多，如马家窑、齐家、辛店、卡诺等文化，反映了这个时代人们进化的历程。这些遗址多集中于青海东部、青藏高原的东边缘黄河上游地区，也恰恰是中原、蒙古、青藏三个区系的交汇地带。

四大文化区系的划分仍然是不同地理状貌的划分结果，从考古文化和人类聚集的实际来看，大体上表现出文化的一致性。但这些区系内部，也如天穹的星区一样，呈现出疏密明暗的不同。不平衡状态是每一个文化区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但这种差别往往是聚居的民族性发展的结果，是在改造环境，利用自然中的心理意识的不同趋向，相对于各区系间的差别要小得多、也隐晦得多。

四大文化区系的划分是地理环境、气候类型、经济方式和考古文化综合起来的“板块”形式，表面上看，它与“东西”或“南北”的划分存在着地域上的交叉，实际上，是科学划分区域文化的深入，是从单纯的地理或人文的分野向综合性的过渡。这种划分还给民族的滋生和活动提供了合理的完整的文化场景，从而成为个体文化区域所依托的空间和定型氛围。

在历史机缘中形成

文化发展是一种历史现象，区域文化的形成更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区域文化虽然是以地域限定的文化类型，但它毕竟脱离了历史的成因和机缘。也只有当某一区域的文化达到成就上的一定水平，出现着在此地域上的文化共同性和文化联系时，真正的文化区域才算形成。一般来讲，区域文化的定型有以下形式：

一是方国文化，这种形式最多，尤其是在中原区系，方国不仅作为一种政治实体，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存在。中国的周代是区域文化成型的重要时代。“封邦建国”的实施，给地域罩上了封国的制度和文化的，封国所发挥的职能统一和巩固了本地域人们的文化观，在这时期，方国的文化界定往往成为地域文化的界定，人们的文化心理和思想意识也附着于以地域显示的封国制度和文化的上。封国促进了地域文化的迅速发展，各国间文化竞争中的紧迫感，促使着各国君主必须去迎合时代需求和文化发展。文化发展又往往是基于本地区特点而演进的，从而使各地域的文化特征得到充分的显露，这种情况造成了即使在同一文化区系中，也有着明显的差别。如同属中原文化区系中的燕赵和齐鲁，前者地处边塞，有英风豪侠、慷慨悲歌的壮阔气概；而齐鲁则是“洙泗上，弦歌地”，以诗书礼义文教著称的圣贤之邦。又如同属南方区系的荆楚和吴越，论刚烈之气，荆楚胜过吴越；论灵秀缠绵，吴越则胜过荆楚。文化发展水平越高，文化差别就越明显，文化区域也就自然显露出来。

二是以地域命名的区域文化，它们往往是一些较为偏远或落后的地区，在早期的中原王朝，对这些地区往往鞭长莫及。这些区域文化的命名也有类型上的不同，有单纯性的地域概念，如岭

南、松辽、西域等。也有以经济生活、宗教信仰及民族源起命名的区域文化，如蒙古草原、西藏、滇黔等等。但是，这些地区几乎都经历过自己的方国时代，有些方国甚至具有地域代表的概念和意义，如滇黔地区的南诏和大理，西藏的吐蕃、岭南的南越、闽台的闽国等等。但由于这些方国基本上被排除在周代封国的范围之外，虽在本地区的文化发展史上有很大意义和作用，但终未能上升到以方国名称代表地域的观念程度，尤其是被正统的中原王朝所认可的程度。但这种情况也有例外，如巴蜀文化，“巴”、“蜀”都是古代存在的方国，后成为本地区文化区域的称谓，但它中间仍有一个巴蜀由国名演变为地名的承接阶段。

区域文化的形成有早有晚，早则如关中地区、中原地区，远在周代封邦建国前就已作为实体而形成。晚则如松辽、蒙古、西藏等，经过岁月的洗礼和中原文化的渗入，终于绽开了显示本土特色的、具有相应程度的区域文化之花。

这些文化区域又是四大文化区系的次一级划分，在本书中，我们将其分列如下：

中原文化区系可以分为关中文化、中原文化、燕赵文化和齐鲁文化，其中的中原文化是中原中的中原。

南方文化区系可以分为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滇黔文化、岭南文化和闽台文化。

北方文化区系分为西域文化、蒙古草原文化和松辽文化。

青藏文化区系分为西藏文化和西藏亚文化。亚文化是文化由此及彼的中和地带，由于这个地带过于宽广，所以我们将其单独分别。

这些区域文化，既是客观的实际存在，又是文化认识中的观念形态。不管是实际存在或观念形态，都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两者代表了地域文化和人文素质，而这些文化区域的成

型，也正是两者的综合。

区域文化的发展阶段

不管哪一种类型的区域文化，都有自己的发展过程。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流动的历史现象，区域文化就是在某一区域中的文化过程，简单地说，也就是区域文化史。既然是过程，也就会显示出阶段性特征。因此，区域文化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区域文化的萌芽阶段，这个时期的文化区域尚不明确稳定，文化水平还不高。它只是在考古文化的角度中，显示出了不同器物类型的一致性，从文献记载中，记述下本地区土著居民的生存状态或民族的初步形成。例如齐鲁文化，在它的萌芽阶段，从考古学的角度显示出海岱文化区的的地方特色及人类发展的系列，从文献记载的角度显示出以东夷人居住为主体的土著文化时代。再如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考古学上已显示出与中原截然不同的风格。而百越人在这个区域的游荡，为后来分化为地域性差异的诸越和区域文化，提供了地理和人文的文化基础。

第二个时期是区域文化的方国时期，它不管时间的迟早，几乎是每个文化区域所必由的一个过程，同时也符合着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尽管各地区的方国并不见得完全被地域限制或占有全部地区，但它却成为这个时期的文化代指。方国时代大致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中原王朝所“封建”的方国，它虽然只是一种统治措施，但在区域文化的形成中却意义重大，最有方国文化的典型意义。一种是以地域名称而包揽着方国事实的类型，如西域曾经经历过方国或部族林立的时代，而西藏也经历了吐蕃和汗国时代。再一种是本地土著自然进化和发展到方国时代，如古代的巴蜀方

国，滇黔的南诏方国等。当然，由于我国早期历史错综复杂、许多古族名、地名也包括方国名称往往混淆在一起而成为多重代指，但方国文化阶段却是区域文化形成的一个关键时期。它的主要成就不在于建立了方国而个体方国也不见得都能形成单个文化区域。但方国发挥着文化的一致性，行使着国家的职能，将该地区的文化提炼、集中和推广，使区域文化成为方国内的统一文化，从而使其成型和稳定。在方国内部，方国发挥着自己的职能，在各层次、各部类中深化着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对外则通过外交、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展开多方面的文化交流。地理环境和民族习性是文化发展所必须考虑的基本因素，在此基础上的文化发展也更富于特色，从而使区域文化更丰满、更充实。

一般来说，方国时期的文化往往显示着区域文化的水平，尤其在方国集中的地域更是如此。邦国林立的状态，从政治上各有分属，文化上有自己的独立性。不同的文化土壤，也造就了百家争鸣的学派大师，从学术上突出了区域文化的特色。这种基于封建基础的区域文化，传承了上古时代丰富多彩的民风遗俗，以邦国的外观形式圈定着风格不一的区域文化氛围，从而使方国成为区域文化中文化实体的代称。古代学术大师荀况就有过这方面的议论，他说：“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荀子·荣辱》）

第三个阶段是区域文化的史志阶段。所谓史志阶段，是指方国消失，社会已进展到一统天下时期。文化区域已被地方行政区划所代替。是以地方行政区划为地域特征的区域文化。这个时期的总体特征是，在一统天下中的统一文化覆被下，诸多区域文化的组合形式有着较大的调整和改观。一部分原属区域文化中的精华，上升到整体文化的高度，而未能达到这种升华程度的学术文化逐渐消解。区域文化的主要内容和特色，往往通过人文心理、风

俗民情、生活方式等深层文化来展现。在某一区域中，由于深层文化的影响，所出现的文化成就也往往具有地域性的因素。但当这些文化成就达到相应的高度时，就成为中华总体文化中的杰出部分。这里，中华总体文化和地区性文化并没有太严格的界限。我们从中华总体文化是由部类文化和地区文化构成的这一观点出发，认识到文化成就的本身离不开创造者主体，而创造者本人又不能脱离他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土壤。

在现今一些关于区域文化的论著中，往往只叙述到方国解体，一统天下这个历史阶段，这意味着某一区域文化到此为止或融进一统天下的总体文化之中。然而地区性文化是否真的不存在了呢？显然没有。实际上，这只是文化区域的形式转化而已。消解与沉淀，转换与创新，永远是文化发展中永不间断的事实和现象。而由方国文化转化为史志文化，也只是文化转换中的阶段性体现而已。而经历了各发展阶段的区域文化，又表现出类型的差异。

文化一体与不同格式

区域文化，一如在某块土地上生长的一片花木、一片果林。我们界定它的标准，是要求在这特定的地域内生长同一种类的花木或果林，它的文化色彩就是这片花木果林所带来的意向景观和色调氛围。但也不能不看到，这片花木果林，也许株株有异，而每株上也有鲜花绿叶和果实的差别。也就是说，在同一文化区域内，也有着千姿百态的文化现象或不同格式。古人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风俗虽不是文化的全部，但毕竟从一个角度反映着复杂的文化差别，更何况文化区域是如此广大辽阔的呢！

同一区域内的文化差别和不同格式也有着文化生成时的各种历史原因。例如，被誉为圣人之邦的齐鲁文化。在它成型时，它

实际上是由齐文化和鲁文化所组成。在封国之前，齐、鲁文化就有不同的渊源。齐鲁区域文化形成之后，这种不同风格依然清晰鲜明。前者开放疏阔，后者保守因循，前者对土著的文化政策是“因其俗，简其礼”；后者则是“变其俗，革其礼。”齐国基于其文化土壤而出现了齐学，出现了象管仲、孙武、孙臆这样豁达的人物及稷下学派；鲁国也同样出现了鲁学，出现了象孔子、颜回、孟子这样的敦厚人物和儒家学派。鲁文化实际上是周文化的派出，是黄土地上农业文化的代表；齐文化则带有更多的海洋文化痕迹，有着更多的东夷文化色彩。弘扬王道、礼治天下是鲁文化的最高理想；力兴霸业，一匡天下是齐文化的现实追求。在鲁文化中，充满了理性和凝重；在齐文化中，透露出功利和空灵。在齐鲁文化区域内，这种不同格式的文化倾向普遍存在，然而却并不妨碍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区域实体。齐、鲁文化始终处于一个相辅相成的统一体中，两者永远是互相的文化比较和补充。齐鲁犹如一扇有开有阖的大门，这扇大门的开阖就显示着不同的文化倾向。这些不同的文化倾向都是相对的，没有鲁文化的浑厚庄重，那显得齐文化的疏朗宽松。所以，它们之间的不同文化格调，并没有形成相互交融时的障碍，正是由于这种差异带来的互补性，使得齐鲁文化成为一体性的区域文化。

其他诸如此类的情况也并非仅见。例如吴越文化区域中吴文化与越文化的差异与吴越之间文化的依存；滇黔文化中两地的文化落差及深层文化的一致性；西域文化中诸多古国的不同与定型居住空间的夹杂错落等。同一区域内的文化不同格式也有着不尽类同的表现形式，但由于总体性的文化趋向，仍然会形成较为稳定的文化区域，从而造成区域文化景观中争奇斗艳的缤纷景象。

在历史的长河中游移

区域文化的形成及发展，都是一个过程。它的文化是由地域性限定了的文化；而所谓的地域，也是由一种文化所笼罩下的地域。文化的模糊性往往使“区域”很难有一个准确的界定，尤其在各个区域文化的交汇地带。这些交汇地带在区域文化的早期，由于地形的制约和人口稀少的原因，还可以从文化的空白限定各个区域文化的固定范围，但当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这些地带便不可避免地带上文化的色彩。这种文化也往往是中性的文化，它夹处于两种或两种以上区域文化之间，在历史的岁月里，它的属性，它的地界范围摇摆不定，表现出“亦此亦彼”的特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国境内的区域文化并不是紧紧相依，连成一片的，也只是靠着这些“亦此亦彼”的文化中和地带，才成为笼罩在神州大地上总体文化的缔结，才成为相互联系、相互交往的文化之网。这些中和地带尤如坚韧的筋络，把各区域文化连结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华之躯。在文化的进展中，这些“亦此亦彼”的地带变化频繁。区域文化的拓宽或发展，也往往是这些“亦此亦彼”地区性质转化的结果。战争、移民和文化浸润、政治划属是使其转化的几种主要形式。在它转化后，又继续向前延伸出“亦此亦彼”的文化地界。这种情况说明，区域文化的划分，始终是一种鸟瞰式的，以文化实际来说明的空间结构。它不能也无法从实地测量中入手，来界定区域文化的空间区域。

文化边界的游移往往以一个侧面显示着区域文化的幅度变化和实体层次。诸多因素造成了区域文化变化的契机。周代的封建制度和军事征伐在很短时间使聚居的文化点纳入方国笼罩下的文化区域内。如齐鲁文化，姜子牙的夜奔营丘，伯禽的直入曲阜很

快使居住在这里的九夷之人和少昊之墟等地方文化笼罩在方国这外壳之下。人口的迁徙和流动更是文化游移的重要因素。如北方的松辽平原，在初期是一个以采集、渔猎和游牧生活为主的地区，随着大批汉人不断迁入和垦殖开发，使这个文化区域迅速形成和不断扩大，最后普及于白山黑水之间。在它鼎盛时，曾几次冲击中原，入主神州。又如岭南文化、闽台文化等，都是中原人士的大量移入，造成这里区域文化的成型和发展，使得它的文化蒙被向外拓宽，文化边界向外游移。最终的文化游移，造成了我国区域文化的全面性缀连。

包罗万象的地理概貌，大千世界的文化景观，悠久历史的风雨洗礼，各地先民的不朽业绩，造就了神州大地上一个个绚丽多彩、姿态万千的区域文化。还是让我们溯文化源头、循历史足迹，去探究各区域文化的演变与发展、去审视在这些地域里涌现的文化硕果，去饱览各地的文化景观，去领略那些千姿百态的各地风俗民情吧！

中原文化区系

齐鲁文化

齐鲁文化是以方国命名的区域文化。周代封邦建国之后，以齐和鲁为代表的封国，把先进的外来文化和高水平的本地土著文化结合起来，创造了有自我特色的本土文化。因此，严格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是在齐、鲁建国后才形成的。这里东临大海，西峙泰岱，北傍燕辽，南依青淮。在这里所树起的泱泱大国，曾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建立起辉煌的霸业。在这里所诞生的孔孟儒学，以其博大恢弘的思想和至上的品格，最早使得中华文明大放光彩；在这里所涌现的文化精神几至成为中华主体文化的缩影，它以其高水平的文化质地，从总体上影响和支配了中华数千年的文化面貌。因此，齐鲁文化在诸多的区域文化中，独树一帜，有着重要的位置和研究价值，它那深厚的文化土壤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一如雄踞的五岳之首泰山一般，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而赞叹不已。